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刘 昊

【摘要】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 15 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 1949 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关键词】贺州; 族群结构; 民族关系;

【作者】刘昊,贺州学院学报编辑部。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059-005

Observing National Relationship Model in Chinese from the Ethnic Structure in Hezhou City

Liu Hao

Abstract: There is very complex ethnic structure in Hezhou City, Guangxi Province, in which there are 15 nationalities including Han, Yao, Zhuang, and so on. Han and Yao who live in Hezhou City usually have at least two groups. Each group lives in Hezhou City identified with the same country and Han's Culture, which stands its sticks strongly by running-in. After 1949, these ethnic groups had set up national relationship model or relationship of ethnic group with "identify but not alike". The situation about the ethnic structure in Hezhou City, and the process of the ethnic structure in Hezhou City can show the Chinese types and features on the national relationship model typically.

Key words: Hezhou City; ethnic structure; national relationship

贺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北面与湖南省永州市接壤,东面与广东省清远市、肇庆市毗邻,南临梧州市,西靠桂林市。在今天贺州境内,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设置过贺县,三国时期吴国于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设置临贺县,隋朝则将临贺县为中心的区域改设为贺州。因此,贺州迄今已有 2100 多年的历史。贺州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聚居的地区,属于南岭民族走廊的枢纽。早在明清之际,贺州就是湘粤桂三省(区)的商品集散地,特殊的历史文化造就了贺州特殊的族群结构。贺州族群结构,是中国民族关系的缩影,是中国民族关系模式变迁的表现——由近代以来的接受型转变为 1949 年之后“和而不同”的融合型。

*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 2010 年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九十年来中共建设学习型政党之教训研究”(批准号为 10JDJNJ100) 的资助。

一、贺州市复杂的族群结构

贺州市总面积 11855 平方公里,总人口 210 万;其中市区面积 25 平方公里,人口 20 多万。从民族成分看,贺州市的民族主要有汉族、瑶族和壮族,另外还有苗族、回族、满族、侗族、仫佬族、蒙古族、布依族和水族等 15 个民族。^{[1]919}从族群的角度看,贺州的居民大约分为二十个以上族群。

在贺州,汉族分为本地人、客家人、铺门人和九都人四大支系。1、本地人主要聚居于大宁、桂岭、开山、大平、水口、步头和贺街等乡镇,但铺门镇除外。有关研究表明,本地人主要是明朝时期闽、浙、赣、湘、粤移民的后裔,占贺州市汉族人口的 42%。2、客家人,占贺州市汉族总人口的 33.8%,均为清朝康熙时期以后来自广东梅县、揭西、揭阳和五华等县移民的后裔,因语言和习俗的差异分为河源、河婆和长乐三个支系,主要聚居于莲塘、沙田、公会、桂岭和黄田等镇,其余分布于除铺门镇之外的贺州市各镇。3、铺门人,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11%,主要聚居于铺门镇,其祖先大约在明朝初年由珠江三角洲地区辗转移居而至。4、九都人,大多数散居于八步、黄田和鹅塘等镇,环绕贺州城区居住,约占汉族总人口的 4%。据九都人的族谱记载,九都人的祖先是来自湖南和江西移居贺州的。

贺州市的瑶族自称“勉”,分为盘瑶和土瑶两个支系。瑶族散居于大平、公会、沙田、里松、贺街、大宁、莲塘、步头、黄洞、桂岭、开山、仁义、鹅塘和水口等乡镇的山区村落。盘瑶自称“扁优”,被称为“过山瑶”或“补寨瑶”,人口 3 万有余,其祖先由湖南、广东和广西的北部、苍梧等地迁入。盘瑶中有一支系自称为“戈带勉”,主要居住在大平乡的利水、小水等村各条山中,人数约 4000 人。土瑶,“自称‘音地勉’,人口 5000 多人,居住在沙田、鹅塘两镇交界之处的明梅、大明、槽碓、金竹、新民和狮东等村的 24 条山中”。^{[1]918}据沙田镇新民村盘弟客收藏的白布质地的《过山榜》记载,贺州的土瑶是宋朝至道元年(995 年)由广东来此作战的土兵定居后繁衍而形成的。

在贺州市,壮族主要聚居在南乡镇、沙田镇和大宁镇以及鹅塘镇的部分村庄。据有关族谱记载,“贺县壮族的祖先来自桂西的河池、宜山、南丹一带,是明朝统治者推行‘以夷制夷’政策而征调到贺县‘平乱’和‘屯田守险’的戍兵及其亲属”。^{[1]918}

来自南方和北方各省的移民群体定居贺州后,往往世代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长期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在捍卫自己的母语方面,客家人最为典型,其严格恪守的祖训之一便是“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在贺州,各个族群都有自己内部的通用语,有多少族群就必定有多少种语言。如,客家人之间通用客家话,土瑶人用其独特的土瑶方言交流。但是,各族群之间平时相互交流所用的语言以客家话、粤语、桂柳话、西南官话和普通话为主。因此,令外地人总不免诧异的是,贺州市的居民大多数通晓至少二种方言。研究移民史的专家范玉春指出,“贺州境内的语言面貌非常复杂,除了瑶语、壮语以外,汉语方言则有官话、粤语、湖南话、客家话、土话、水东话、拐拐话等,其中以官话和粤语影响最大”。^{[2]309}而各种方言又可以明显地分为更细的几类,如,客家话可分为河源话、河婆话和长乐话。

二、族群关系“和而不同”只源于认同

族群关系不仅由国家的政策主导,与相互经济交流息息相关,而且与各族群相互间的文化认同程度成正比。各个族群,即便是属于同一民族的族群,也往往具有各自的语言文化特性。人类学研究表明,“族群是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人们的群体,这个群体拥有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身份认同感。文化是将这群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通过对特定文化特质的强调,使这个群体具有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界线’”。^{[3]29-30}可见,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经过

数百年磨合缓慢形成的文化认同是族群间和睦相处的最牢固的基础，文化认同是正确处理族群关系的枢纽。必须注意的是，文化认同并非是要逐步同化——具有同样的文化内容，只是自然而然地在保持“不同”的情况下求得“和”的隐形手段而已。求得了“和”，才能做到“天下一家”而共建共享太平盛世。

所谓“天下一家”，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宣传和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理想的境界，在贺州族群关系上通过“和而不同”的方式求同存异，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首先，密切的经济联系是各族群和睦的纽带。在经济上，各个族群的同胞通过互通有无，既于无形之中构成了一个优势互补的经济体，又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联系。例如，有史以来，瑶族同胞出售他们的山货等土特产品，尤其是中草药，向以汉族为主的各个族群的同胞购买自己所需之物品。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少数民族族群的一些同胞走出深山，租佃汉族人的店面经商，或租种汉族人的水稻田；而汉族人也深入少数民族同胞聚居的区域进行各种经济活动。

其次，文化认同在客观上有明确指向。贺州各个族群均认同汉文化，绝大多数人至少会说汉语中的某一种方言。如，瑶族认同汉族文化，很多瑶族同胞会写少量汉字用于日常记事，瑶族许多家族的族谱和日常使用的文稿之类都是用汉字写成的。即使是没有上学的村姑，也会依葫芦画瓢绣汉字。笔者走访瑶寨见到一块“情人巾”——姑娘送给心上人的毛巾，该毛巾上所绣的情诗用通用的汉字写成，仅仅个别笔画多的汉字则用她们自创的简化字代替。当然，大多数瑶族同胞使用汉字记事，很多情况下仅仅是记录读音而已。

再次，1949年以来，贺州各级党政机关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宣传并认真践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随着交通改善和各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民族平等和经济互助的局面形成后，各族群间互不信任、互相戒备或相互仇视的心理才得以慢慢改变。族群成员的交往态度、交往范围开始发生变化，彼此通婚的族群和地域范围也在扩大”。^{[4]34}在贺州市各族群之间，民族间以前明显的各种传统差别正在逐渐消失，相互间的了解更多，以至于相互间的理解和认同日益增强。尤其是不同民族的族群之间，通婚的现象逐渐增多。不同族群之间，因为通婚在生产技术上相互交流以致共同提高，在语言上也有趋同的苗头，在思想文化方面也表现为相互融合。

各个族群间的“和”，在族群交往方面表现的更明显，有几类事最值得一提。第一类，每年二月初二的“吃节”最具代表性。不论属于哪一个族群，只要相识，无论是否拿礼品，均可到对方家里去吃大餐。各家各户都邀人到自己家吃饭，以来自家吃饭的人多为荣。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如此以食为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族群间的交往。第二类，每年六月初六，湖南会馆举办纪念大禹诞辰的祭祀等大型活动，吸引了许多贺州人前往。参加祭祀等活动者，往往笼统说自己祖籍湖南。很多人尽管其祖先定居贺州以来已经有五六代人了，事实上的确成了土生土长的贺州人了，也来参加湖南会馆的活动并慷慨解囊，并非为别的，只是以此增加与不同族群的人交往的机会而已。第三类，大约以三年为期，在农历十月至十二月间某个吉日举行的瑶族盘王节，是以瑶族为主体的当地各族群人的盛大节日，既加强了瑶族同胞内部的感情联系，又加强了瑶族与其生活区域附近各族群居民之间的联系。

在贺州，各个族群既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做到了“和”——和睦相处，也保持了自己多方面的“不同”——民族的或族群的某些传统特色。

三、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表现

贺州市境内各个族群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这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或族群分布状况的缩影，也是贺州市境内各族群在至少上百年不断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各族群相互离不开的主要基础。各族群同胞杂居在一起，既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往学习，有利于各自取长补短，也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最终实现事实上的平等。

民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

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虽然包括数目不等的族群,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它的确是相对稳定的共同体。正如斯大林所言“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5]61}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各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不同的民族关系。有关研究表明,“在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形态里的各种社会主体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久而久之,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关系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主导民族接受少数民族的接受型模式;第二种是主导民族不接受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排斥型模式;第三种是先进发达的主导民族团结少数民族从而实现各民族平等的融合模式”。^{[6]23-24}大致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也不例外,在有的历史时期的某些区域,民族关系是某种单一的模式,也可能是以上模式的复合模式。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已经从总体上构建了融合模式主导的,而以接受型模式为辅的中国民族关系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汉族是先进发达的主导民族,中国政府通过制定多种特殊政策,以多种方式团结少数民族、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力求尽快实现各民族各个族群间事实上的平等,在维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提高各少数民族的汉文化认同程度。这样,中国的民族关系表现为融合模式。然而,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和宁夏这些民族自治区,汉族成了相对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族群,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回族等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接受汉族,认同汉族文化,民族关系在此也表现为接受型模式。可见,中国民族关系的两种模式,通过贺州的族群结构得到了充分展示。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历来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民族和谐始终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之一,也是社会和谐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统治者求长治久安所不可轻视的问题。处于同一政权统治下的有意识的自觉的国家认同是外因,而对汉文化在总体上潜移默化的认同则是内因。正由于个中原因,中国民族关系模式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

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甚至悬殊,这是造成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各民族在总体上冲突的过程中有接受和融合,在总体上接受与融合的过程中又有冲突。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在各种合力的调适下艰难地构建。民族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发展到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程度。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国内多民族绝对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7]100}国家采取民族区域自治之类特殊政策,通过对少数民族实行各种优待等措施保证实现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使有着一定聚居区的少数民族有当家作主和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并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经济和文化,确保少数民族能保留其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仪式、语言文字等,并诚心诚意大力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有利于民族融合,而且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

徐杰舜先生等人在进行多年的田野调查后认为,“贺州民族的地理分界十分清晰。汉族分布在交通方便、商业繁荣、水利良好、农业发达的地方;壮族除聚居在南乡盆地外,大多分布在山口路头;瑶族分布极为分散,几乎都在山区、交通极为闭塞的地方”。^{[8]140}各民族人口如此分布,相应地,语言的分布也十分复杂而饶有趣味。有关研究表明,族群间的互动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语言的互动。“贺州汉族族群的语言是极为复杂,有多少个族群就有多少种语言,……复杂的语言结构,使得各族群相互识别及内部认同时保持自己原有的语言特征,形成与他族群迥然有别的语言边界”。^{[8]107}贺州市的很多行政村,日常生活通用多种方言。如,鹅塘镇的盘谷村,“只要你在盘谷墟市上漫步,或与盘谷村民交流都可以领略到近十种语言。盘谷村民也一般都会讲三种以上,多者十种方言”。^{[8]142}这种语言状况,使阅历丰富、学业精深的人类学专家也不免发出感叹:“在盘谷这个地方,各族群的人都称得上是语言高手,他们几乎人人都精通多种方言”。^{[8]150}无论男女老幼,见到什么族群的人,谁先开口,双方就用谁所在族群的方言交谈。为何会如此和谐呢?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各族群上百年互相认同、互相友好往来的结晶”。^{[8]151}

一般来说,“贺州族群间的互动是频繁而又复杂多样的”。^{[8]147}各族群间的互动不仅表现在如前所述及的语言方面,还表现在生产生活、经济交往、婚姻关系、社交礼仪等方面。不同民族的族群

间在婚姻方面的互动,更加具有深远的意义,肇始于民国时期,盛行于改革开放之后。各种史料记载和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情况均表明,“在频繁的互动中建立了深厚感情,各族群的通婚越来越普遍,尤其是瑶女外嫁壮族、客家人、本地人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为瑶族所接受”。^{[8]157}令人欣喜的是,“贺州市的族群与民族婚姻互动大多是频繁而健康向上的,通过互动,也加深了各族群各民族的认同感”。^{[8]161}“在族群互动中各族群不仅交流文化,而且还交流思想和感情,从而发生文化适应,达到族群间的相互认同”。^{[8]208}

贺州各族群在互动的过程中,由语言互动的磨合开始,随着交往的增多,还出现了婚姻互动的磨合和民间信仰互动的磨合。特别是民间信仰互动磨合,使族群间的关系在更深的层次上融洽。如此,各族群之间因文化诸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矛盾和冲突逐渐减少,认同感日益增强,和谐的族群关系、族群结构自然是水到渠成了。“总之,正是由于制度正确、经济发展、扶贫有效、政策落实、教育推动、语言互动、婚姻互通、历史磨合等原因所形成的合力,使得贺州的民族团结安如磐石”。^{[8]241}

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民族成分多样。在历史时期各民族或族群难免有种种冲突,但始终在互动的漫长过程中由相互接受走上和睦相处,乃至呈现出融合的大趋势。贺州族群结构在良性互动中日益和谐,表现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也为反思某些时期的中国民族关系模式提供了一个范例。

参考文献:

- [1] 1990年人口普查各民族人口分布表[M],贺州市志(下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 [2] 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3] 王静宜,丁文君.族群概念界说[J].思想战线(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09,(35).
- [4] 韦浩明.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贺州族群问题研究[J].民族丛刊,2006,(6).
- [5]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谷中原,吴师法.民族生成与民族关系模式[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 [7] 列宁.列宁全集[M],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8] 徐杰舜等.从磨合到整合:贺州族群关系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李妍)